

行者无疆^{*}

——阿克洛夫的心理—社会—人类经济学述评

胡倩影

提要: 很长时间以来, 经济学理论的发展遵循着一套默认的“正统”假设。这套自成体系的假设规定着经济学的写作模式, 为经济学模型提供合理化解释, 同时, 也使得对于其他假设可能性的思考一度成了经济学中的“禁忌”。作为信息经济学奠基人之一,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乔治·A. 阿克洛夫(George A. Akerlof)以他著名的“柠檬原理”蜚声学界, 但他却有着一个更高的学术梦想: 根据凯恩斯《通论》的精神, 创立心理—社会—人类经济学(psycho-socio-anthrop economics, 简称PSA经济学), 将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其他社会学科的研究成果引入经济学模型中, 探索经济学理论新假设的有趣结果。本文在介绍阿克洛夫主要学术作品的基础上, 着重对PSA经济学中的社会学假设进行分析, 并对PSA经济学的发展潜力以及由其引发的经济学和社会学关系的重新定位做出了思考。

关键词: 心理—社会—人类经济学(PSA经济学) 信息依赖 社会习俗 非自愿失业

一、背景介绍

(一) 引言

2001年, 瑞典皇家科学院将当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乔治·A. 阿克洛夫(George A. Akerlof)等三位经济学家^①以表彰他们在市场信息不对称研究中所做出的卓越贡献。瑞典皇家科学院在颁奖公告中提到, 20多年来, 市场不对称信息理论在经济学领域已成为一个关键并富有

^{*} 本文的写作得到了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刘世定教授的悉心指导,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系阿克洛夫教授热情解答了笔者提出的疑问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文献, 笔者在此表示感谢。

^① 与乔治·A. 阿克洛夫分享当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另一位学者是斯坦福大学经济学系教授A. 米歇尔·斯宾塞(A. Michael Spence)、哥伦比亚经济学系教授约瑟夫·E. 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 对于他们学术成就的详细介绍可登陆诺贝尔奖官方网站(<http://nobelprize.org/nobel-prizes/economics/laureates/2001/index.html>), 在本文中不再赘述。

生命力的理论,“信息不完全”已成了研究者不可或缺的研究工具。而阿克洛夫于1970年发表的具有原创性贡献的论文《柠檬市场——质量不确定性和市场机制》(简称《柠檬市场》)为信息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①

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荣耀为阿克洛夫贴上了信息经济学奠基人的标签,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导致他在“发展信息经济学”之上的一个更大的学术梦想未能引起学界太多的关注和讨论。阿克洛夫在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颁奖典礼上发表了题为《行为宏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行为》的演讲。演讲中,他语出惊人,声称使他获得经济学界最高荣誉的“信息不对称”研究只是他梦想的第一步,而他的最终目的是根据梅纳德·凯恩斯《通论》的精神发展出一门宏观经济学,将诸如认知偏差、互惠互利、认同、公平感、从众、社会地位等在《通论》中十分强调却被当今盛行的新古典经济学抛弃的心理和社会因素引入经济学的假设,并在对这些行为观察的基础上,为宏观经济学理论提供更为坚实的基础(Akerlof, 2002)。

为了对阿克洛夫的学术观点有更好的了解,在此有必要花些笔墨回顾一段宏观经济学思想史。

在宏观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对宏观经济学微观基础的讨论就未曾停止过。20世纪60年代之前的经济学模型基本上基于4个假设:1)完全竞争的市场;2)一般的均衡模型;3)利润最大化的企业;4)效用最大化的消费者。在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理论出现危机后,试图将旧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嫁接”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新古典综合”学派,在一般均衡模型中引入了固定代币工资的条件,以此来解释经济的周期波动和对充分就业的偏离,却忽视了凯恩斯在《通论》中关于心理倾向和社会因素对行动者经济行为决策影响的精彩论述。

19世纪70年代兴起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抓住了这种空中楼阁式的理论的薄弱之处,转而寻求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并在价格和工资决策的微观基础建构上取得一定进展。新古典经济学家关心的是基于经济人个体自利行为的市场均衡。在他们看来,经济人的预期即使不是绝对精确的,就其面对的环境而言也是充分的,从这个意义上看,人的预期是理性的。在引入理性预期的关键性行为假设之后,以卢卡斯

^① 更为详细的介绍亦可参阅诺贝尔奖官方网站的相关信息。

为代表的此派学者认为,如果个人和工商业是按“理性”方式形成他们对未来经济事件的预期,政府政策变化产生的影响就会比标准的凯恩斯学派模型所预测的影响要小得多。^①尽管他们与新古典综合学派一样,仍然以竞争性的一般均衡模型为基础,但更加坚信市场经济是自我调节的,政府政策在系统地稳定经济方面收效甚微。他们还主张应当将宏观经济学理论建立在市场始终出清和经济行为者始终实现最优化的假定基础之上,以此取代凯恩斯主义经济学。

但问题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模型中得出的“市场出清”和“充分就业”结论显然是与现实生活中切实存在的“失业现象”、“工资高于市场出清水平”这些经验事实相抵触。

为了克服上述理论中将人的行为目的过度简化以至于脱离实际的倾向,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今,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都发展出了一系列旨在将经济学理论与各种现实行为相结合的模式。凯恩斯的追随者们没有放弃“复兴凯恩斯主义”的愿望,他们正试图根据《通论》的精神,在更深层次的个体行为之上重建被新古典经济学颠覆的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而阿克洛夫就是这一阵营中的领军人物。

阿克洛夫在获奖演说中指出,新古典模型的行为假设是如此简单粗糙,以至于它很难解释在现实社会中确实存在的6个宏观经济现象。^②他认为,这些问题之所以在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之中被自动取消,其原因在于新古典模型的关键假设在逻辑上存在漏洞,其理性预期暗含的逻辑是,只有那些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主体进行行动时所表现出来的经济学现象才会被纳入经济模型的考虑之中,因而屏蔽了探讨诸如“非自愿失业”等一系列宏观问题的可能性。

以阿克洛夫为代表的新行为经济学强调人行为中的“非理性”一面,并认为“这种行为并不是主流经济学家所认为的随机偏误,而是可以预测并作系统研究的经济学非理性行为”。^③阿克洛夫认为凯恩斯“资本主义经济会有一个非自愿失业持续存在的均衡”这一判断是正确

① 具体论述可参见卢卡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的讲演(Lucas, 1995)。

② 阿克洛夫所认为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很难解释的6个现象分别是:1)非自愿失业的存在;2)货币政策对产出和就业的影响;3)当失业率很高时,通货紧缩并没有加速;4)普遍存在的退休储蓄不足;5)股票价格相对于其基本面的过度波动;6)痼疾难消的贫困和自暴自弃的底层社会,演讲中文版全文可参见阿克洛夫(2002)。

③ 具体论述参见斯威德伯格《经济学与社会学》第三章对阿克洛夫采访的文字资料。

的,但不是源于任何能从现有经济学理论中推导出来的原因,而是来自其他社会科学家所作的研究。阿克洛夫相信,问题不是出在凯恩斯身上,而是出在经济学的传统假设上。若是将社会学等其他社会学科学的研究成果引入经济学假设,凯恩斯的观点在严谨的经济学框架内便会重新浮现。

这是历史上首位在获奖演说中公开强调社会学方法对经济学研究重要意义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他将社会学的种种研究成果引入经济学假设的同时,也使这场原本只属于经济学范畴的学术论战有了从社会学视角去探讨的可能性和意义。

(二)经济学和社会学之间的互动及阿克洛夫 PSA 经济学的研究路径

经济学与社会学虽然同是以研究人类社会生活为目的的学科,却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上长期保持着明确的界限,典型的经济学家和典型的社会学家在上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都处于互不了解、互不关心的隔绝状态。上世纪 70 年代之后,在一些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努力之下,这种“老死不相往来”的局面正慢慢被改变。

在经济学和社会学当代关系的任何一种讨论中,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都是一个极其关键的人物,根据其博士论文修改后出版的《歧视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Discrimination*)第一次打破了经济学和社会学的传统分工,将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运用到了非经济学主题上(斯威德伯格, 2003)。此外,贝克尔更是一个不断开拓其经济学分析法应用范围的人。在《人类行为的经济学分析》(*The Economic Approach to Human Behavior*)这本纲领性著作中,贝克尔这样描述他的方法:“在我看来,最大化行为、市场均衡和偏好稳定综合假设及其不折不扣的运用,构成了经济分析的核心”(Berker, 1976)。他对经济分析法的运用前景充满信心,并开始涉足于“人力资本、婚姻以及犯罪与惩罚”等传统社会学研究主题,这也使得他的经济分析法被冠以“经济学帝国主义”的称号。尽管贝克尔的研究成果被经济学界和社会学界共同肯定,但是“经济学帝国主义”一词所具有的挑衅意味加上经济学家们向来具有的学科自信,使得他所倡导的经济分析法引起了学界(尤其是社会学界)的众多质疑和排斥。

随着经济学帝国主义所带来的压力逐渐增大,社会学家中也产生了要依靠社会学方法独立研究经济学问题的力量。哈里森·怀特

(Harrison White)和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将社会网络分析法(Network Approach)直接运用于生产、分配和消费等经济学的核心命题,并指出在这些问题上增加一些社会学视角在某种程度上十分关键。19世纪80年代,格兰诺维特在他对“新经济社会学”的系统阐述中,批判了经济学的低度社会化假定和社会学的过度社会化假定,主张人的经济行为是嵌入在人际网络关系的(Granovetter, 1985)。所谓“嵌入”的含义是:个人和大的经济体的经济行为,如价格的决定和经济制度等都受到社会网络的影响。而经济学的个体主义方法论恰恰很少考虑到这一点。在这里,格氏尝试以社会学中的研究人的视角来挑战主流经济学中关于人的基本假设。

尽管上述两种分析方法在立场上针锋相对,但是其内在逻辑却如出一辙,即通过打破传统经济学只研究“经济问题”,社会学只研究“非经济问题”的界限,扩展了本学科分析方法的运用范围,并试图解决对方“管辖范围内”迟迟不能解决的问题。然而,我们应该注意到,这种研究主题界限的打破,并不意味着经济学和社会学彼此之间的理解有所增加,在某种角度来看,分析方法在研究主题领域方面的拓展,是建立在不认可对方先前的研究方法和结论的基础上的。这一点我们从贝克尔和格兰诺维特含蓄但尖锐的相互批评中可以体会出来。^①

与经济分析和社会网络分析这两种雄心勃勃的分析方法相比,阿克洛夫的分析方法开辟了经济学与社会学对话的新道路,也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探讨经济学与社会学关系的角度。

从《柠檬市场》的写作开始,他便逐渐发展出了一套自称为“心理—社会—人类经济学”(Psycho-Socio-Anthrop Economics, 简称PSA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来阐述自己的观点。这一分析方法的特点主要体现在理论前提、理论形成和理论结果检验这三个方面(刘凤良、江艇, 2004)。在经济学的理论前提上,PSA经济学认为,应该充分借鉴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成果,以增强经济学理论假设的真实性;在理论形成上,应该更强调解释真实观察到的行为,而不是将经济学的数理模型当成整个现实世界;在理论结果的检验上,应该吸取更多样化的实证研究方

^① 格兰诺维特在接受斯威德伯格采访时曾说,“我将所有的精力都集中于生产、商品和服务这类经济学硬核的原因,部分是论战性的。因为在我看来,如果我们能表明这些经济学帝国主义者连他们自己领域里的问题都处理不了,那么很显然,他们领域之外的传统社会学领域内的问题当然会更觉得吃力。”(斯威德伯格, 2003: 143)

法,比如社会学、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和心理学的实验数据。

与贝克尔大力向其他社会科学“出口”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相对,阿克洛夫则试图把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进口”到经济学理论中,以修改经济学的传统解释。一方面,贝克尔雄心勃勃地要将其理性选择理论尽可能推广到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中,阿克洛夫则从其他社会科学中获得灵感,他在接受斯威德伯格的采访中谦虚地表示:“我的分析方法(指PSA经济学分析法)可以用于我在经济学中真正关心的事情,主要是当代经济中的失业问题和为什么贫穷国家如此贫穷的问题”(斯威德伯格,2003:93)。因此,我们可以这样总结,贝克尔试图挖掘经济学分析方法的潜力,而阿克洛夫则更多地看到了经济学本身的局限性,当经济学理论本身不能解释现实生活中的某些重要问题时,它就需要社会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帮助。

阿克洛夫与格兰诺维特“将社会学因素引入经济学研究”的想法是相似的,但在格氏的网络分析法中,经济制度被看作了一种社会结构,从而在分析过程中抛弃了经济学中的一般均衡模型。而阿克洛夫的PSA经济学却建立在经济学的坚实基础上,它承接了经济学的均衡假设,理论创建过程中仍旧使用了强大的经济学数理工具,与其他传统经济学家不同的是,他吸收了社会学的研究成果来为其修改经济学理论前提假设提供依据。

与社会问题的经济学研究或经济问题的社会学研究相比,阿克洛夫的PSA经济学分析法放弃了征服者的姿态,少了对其他社会学科的敌意,实际上更是以问题为导向,为了解决人类生活中的某一类实际问题,或者解释理论上不存在但生活中却比比皆是的现象,对经济学和社会学(包括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做了实质性的结合,并期待这种结合所产生的“化学效应”为问题找到更有说服力的解释。

阿克洛夫是一位梦想者,也是一位实践者。他的PSA经济学研究取向集中体现在1984年出版的论文集《一位经济理论家讲述的故事——关于经济理论新假设有趣结果的论文集》中(以下简称《故事》),书中收入了8篇阿克洛夫发表于上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的论文,带着对凯恩斯主义的反思和对宏观经济学微观基础的探寻,这些论文的构思与写作对此后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和行为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下面两个部分中,笔者将选择该论文集中与社会学研究成果关系

密切的论文进行介绍,并以阿克洛夫的其他学术作品作为补充。介绍将以其涉及的社会学主题从简单到复杂进行归类,从最为人所熟悉的信息不对称开始到社会习俗与歧视、群体规范与互惠、社会距离与社会互动的相关探讨。对于每一个阿克洛夫涉及的社会学主题,笔者尝试挖掘其相关的社会学假设在其经济学模型中所产生的作用。

二、阿克洛夫主要作品介绍

(一)“柠檬市场”

《故事》开篇的文章即是后来被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奖委员会誉为“信息经济学最为重要的奠基性文献”的《柠檬市场——质量不确定性和市场机制》。而在本文中,它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这是阿克洛夫运用PSA经济学分析法进行写作的首次尝试。

论文试图分析的是一个随着市场的出现便存在至今,却长期未能引起经济学界足够重视的古老问题:市场双方拥有信息的不对称所造成的交易不确定性。文章以“二手车交易市场”为例,指出人们之所以宁愿买新车而非二手车,其原因不仅是人们对于新车有单纯的偏好,更可能的解释是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即二手车卖主比买主拥有更多关于汽车质量的信息,潜在买者无法判断产品质量的高低,在对对方出售商品的动机存有怀疑的情况下,买主试图通过降低出价来弥补自己信息上的不足。而此时,高质量车的卖者将逐渐退出市场,留在市场中供买主选择的也只能是低质量车。这样便导致“逆向选择”的出现:买者只愿意出更低的价格,而卖者也会提供质量更差的车,其后果是“柠檬”(英语中对“劣质产品”的俗称)不断将好的产品排挤出市场,最终导致市场的消失。

阿克洛夫继而指出信息不对称而引发的逆向选择在现实的各种交易市场中是普遍存在的。

诸如在保险市场中,由于投保人比保险公司更了解自身的身体状况,保险公司只能提高医疗保险的价格来匹配他们需要承担的风险,而这样做的结果是,只有认为自身健康状况较差的人才会继续投保,于是参加保险者的平均健康状况随着保价的提高而下降,最终导致保险公司经常拒绝年老的投保人,这一现象的存在也为医疗保险制度的建立

提供了依据。文中所举的例子还包括欠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以及少数民族受到的就业歧视问题。

阿克洛夫在此论文中的另一个基本观点是,在市场上用“柠檬”进行欺诈的卖者,将促使整个市场趋于瓦解,因为他们逐渐将合法交易活动逐出市场。经济主体又具有强烈的动机来消除这种不良影响,许多市场机制可以被看作是为了增加信息的确定性而出现的:比如二手市场的专业销售商、品质保证书、品牌产品、连锁店、各种技术教育认证等。

(二)不良竞争与种姓经济学

第二篇《种姓经济学及其他悲惨故事》(以下简称《种姓经济》)内容上可分为不良竞争和种姓经济学两部分,不良竞争部分实际上是《柠檬市场》的修订和延续,由于现实生活中的信息既不完全也不免费,在对信息需求和信息成本进行权衡之后,人们通常基于容易观测到的有限特征来预测经济和经济个体的行为,由此文章提出了“指示器”(indicator)的概念。第一类“指示器”是纯粹自然生产层面上的,比如在“分成租田制”的例子中,人们将产量作为识别佃农耕种时付出努力多少的“指示器”,以代替对他们的劳动监督,而在工作条件的选择中,愿意在劳动强度更大的生产线上工作的工人通常被视为更具竞争力。而第二类“指示器”则更具有社会学意涵,因为它将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在描述一个社会时所使用的整体文化特征纳入了经济学模型。这类基于社会习俗和文化的“指示器”包括一个人的阶层、种族、性别、财产、个人相貌或工作职位等(阿克洛夫,2006)。而指示器的引入使得经济学中的均衡完全有可能出现对于帕累托最优的偏离。

而种姓经济在阿克洛夫自己看来是更为有意思的部分,因为它完全不同于传统经济学中的完全竞争市场。在这部分,阿克洛夫将种姓作为“指示器”运用到了对歧视的分析上,并提出源于社会因素的“指示器”,会导致经济陷入低水平均衡的陷阱。例如雇主在某些情形下,会根据某一种族的平均素质来预测该种族中个体的素质。如果使用了这类指示器,由于种族中的所有个体都被视为相同的,从而不论个体良莠都支付同样的工资,那么对于该种族而言,它的任何自我改进动机都将被摧毁。这样,偏见将导致一种低水平陷阱:如果偏见坚信一个种族不够资格,那么该种族的人群可能就没有动机使自己成为有资格者,于是

便出现了默顿所提出的“自我实现的预言”。^①而对于那些企图打破既成规范的人,等待他们的不一定是经济利益,更可能是不遵守规范所导致的严重后果。文中举了印度的婚姻习俗的例子^②,那些不按照婚姻习俗办事的人,不仅不能获得成功套利的利润,而且还要遭受被剥夺种姓的惩罚。因此在理性的权衡利弊之后,尽管离经叛道者在一时可能获得可观的利益,但是遵守社会主流习俗规范的人仍然获得更为有利的经济报酬,这也为此类社会习俗的延续提供了经济原因。

(三)高于市场出清的工资与非自愿失业

按照阿克洛夫自己的说法,《柠檬市场》和《种姓经济》的写作初衷是为了考察导致周期经济行为(包括非自愿失业在内)的合同形式,却在无意间打开了信息经济学的大门。尽管信息不对称在各种市场上具有普遍存在的意义,但它绝非市场问题的万能解药。至少在“失业”这个阿克洛夫最初想探询的问题上,信息不对称的解释力是有限的(Akerlof, 1984b: 83)。阿克洛夫为了获得对“非自愿失业”更具说服力的解释,转而寻求社会学研究的帮助,并提出了非自愿失业的社会习俗模型,下面介绍的三篇文章,分别从社会习俗的维持、工作职位的排他性质、社会习俗的形成三个角度来探讨非自愿失业的社会学原因。

《社会习俗理论及其失业影响》一文,承接了《种姓经济》对于社会习俗的讨论,在更为普遍的层面上,向传统的对于社会习俗与获利动机的边际分析提出挑战。文章指出边际分析法所认为的获利动机和遵守社会习俗的关系具有偏好上的相互替代性,或许能够解释在某一静态时间点上的歧视情况,却无法解释经济利益的诱惑为何不能在一个较长的时间跨度中逐渐改变人们的偏好,继而使得无经济收益的社会习俗趋向消解。相对新古典经济学中基于“个体行为最大化”描述的单一均衡,阿克洛夫提出了一个“非个体行为最大化”的多重均衡,用以描述人们在选择遵守何种行为规范。这一模型对依据社会规范做出的社会学解释和依据经济动机做出的经济学解释进行了中和,在多重均衡模型中,社会习俗从得以维持的均衡向逐渐消解的均衡移动的过

① 根据默顿的界定,“自我实现预言”是指:由于开始时的一个虚假的情境定义引发了新的行动,因而使原有虚假的东西变成了真实的(默顿, 2001: 288)。

② 关于印度婚姻习俗的描述可参见阿克洛夫《故事》一书中《种姓经济学、老鼠竞赛经济学及其他悲惨故事》的“种姓与集团组织”一章。

程得到了分析。假如不遵守习俗会导致足够的声誉损失或不遵守的成本足够大,那么一种社会习俗一旦建立就会持续下去。如果从效用损失来看,习俗遵守的代价过于高昂,那么习俗终将销声匿迹。如果将此模型运用于失业的分析,那么,可以假设有一种以比率 W (高于市场出清水平) 来交换资本和劳动力的社会规定,雇主考虑到打破这种规定带来的不良后果,便遵循这一规定,按照 W 来交换劳动力,从而导致非自愿失业的出现。

《以“坝址”看待工作职位》一文的核心假设是,一个工作职位如同只能建造一个大坝的坝址,有且只能有一个人占据。一个坝址有它本身的价值,如果建造的大坝没能充分发挥坝址的价值,即使具有诸如蓄水等生产性功能,从坝址价值被浪费的角度看,也是得不偿失的。那么这个类比隐喻的结果是,一个职位本身也有其经济价值,如果只有熟练工才能将其价值充分发挥,那么,不论非熟练工人的工资怎样灵活,都无法通过工资竞价来获得职位,因为他创造的价值无法补偿职位本身的价值的浪费。

在《部分视为礼物交换的劳动合同》中,阿克洛夫依据企业对工人行为反应来解释非自愿失业的问题。文章首先引述了霍曼斯对于美国某公司社会关系研究的案例:该公司记账员群体的工作量超过了公司规定的标准,而公司则支付他们高于市场出清的工资。这一明显违背了新古典模型对工人效用最大化和企业利润最大化前提假设的案例,在阿克洛夫看来却能很好地用“礼物交换规范”这一标准的社会学模型来解释。员工将超出标准的额外劳动作为向企业表示忠诚的礼物,而企业则回赠他们较高的工资报酬和宽松的工作环境。这种雇主和雇员之间的“互惠”程度则是由企业内部形成的群体规范决定的。

为清晰起见,笔者总结了传统经济学和传统社会学的主题和假设相互交叉所产生的几种主要研究路径和研究内容,为下文对 PSA 经济学中的社会学假设进行具体分析提供参照,详见图 1。

三、PSA 经济学中的社会学假设分析

阿克洛夫在接受斯威德伯格的采访时说,《柠檬市场》在某种程度上已经社会学化了。在第二篇《种姓制度经济学中》这种社会化趋向更

假 设

传统经济学

传统社会学

传统经济学
主
题
传统社会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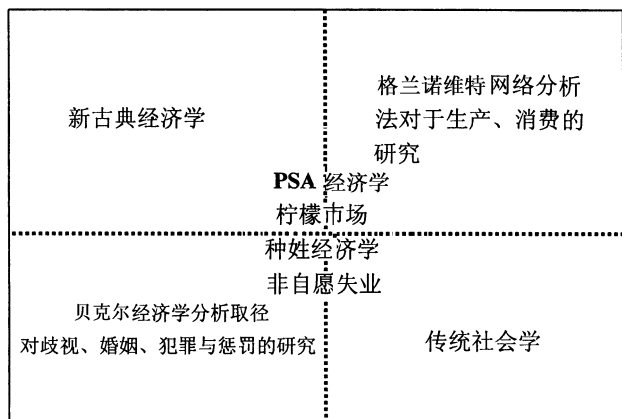


图1 经济学—社会学互动的研究取向

为明显(斯威德伯格, 2003: 88)。

阿克洛夫所指的“社会学化”最显而易见的层面即文章的主题。文中对于欺诈成本、老年人的保险、少数民族的就业等问题的探讨, 已经超越传统经济学单纯对生产、消费等环节的考量, 而体现了对社会学向来关注的“信任与欺诈”、“歧视与分层”等主题的呼应。如果把阿克洛夫所指的“社会学化”仅理解为一个经济学家对于社会学研究主题的探讨, 又难免显得过于肤浅, 阿克洛夫理论对于社会学和经济学互动的启示意义也将不值得笔者花如此篇幅去介绍, 因为加里·贝克尔的经济学分析法在阿克洛夫之前已迈出了深入社会学研究领域的步伐。在本文中, 笔者更感兴趣的是对于阿克洛夫 PSA 经济学中“社会学化”主题背后更为本质的“社会学化”假设的分析。

(一)信息不对称与信息依赖

对于阿克洛夫“柠檬原理”最简单的论述就是, 由于逆向选择的存在, “柠檬”驱逐了“高质量产品”, 使市场趋于萎缩甚至消失。《柠檬市场》发表之后, 经济学界对于该原理的探讨主要集中于逆向选择引发后

果的现实性和严重性。^① 这些讨论不约而同地将“信息不对称”默认为引发“逆向选择”的直接原因。而笔者认为,这个判断至少是不完全的。

首先让我们回到阿克洛夫的《柠檬市场》。文章以“二手车交易”市场为例,探讨了“逆向选择”的出现过程:

由于卖主现在比买主拥有更多关于汽车质量的信息,故在可获得的信息方面出现了不对称性……低质量汽车很可能将高质量汽车驱逐出市场,而其原因在于低质量汽车与高质量汽车以完全相同的价格销售。而低质量汽车之所以能够按照与高质量汽车相同的价格销售,是因为买主无法辨别高低质量汽车的区别,只有卖主才知道这一点。(阿克洛夫,2006:9)

单纯的从文字表述中分析,我们的确很容易得出结论说:因为信息不对称的存在,买者无法辨别汽车质量的高低,因此卖者有动机在市场上以与高质量汽车相同的价格出售低质量的产品,所以导致“逆向选择”的出现,高质量产品被逐出了市场。整套逻辑的核心似乎在于“信息不对称”。

如果仔细推敲这个逻辑推论,笔者将重新思考以下几个问题:

1. 高质量汽车是如何被驱逐出市场的?
2. 低质量汽车和高质量汽车按照何种相同的价格出售?
3. 为什么会以这种相同的价格出售?

尽管阿克洛夫已经明确指出,高质量产品退出市场的后果应当包括在卖主用“柠檬”进行欺诈的成本之中^②,我们同时应该注意到,高质量的产品退出市场的最直接的原因不在于他们无法与“柠檬”共存于一个市场,而是卖者无法接受买者开出的过低的价格(这种价格将使得卖者无法获得汽车的实际价值)。看似矛盾的是,阿克洛夫又在《柠檬市场》中指出,市场上原本有一些高质量商品的潜在购买者,同时也存在愿意在适当的价格范围内销售这些商品的潜在卖主。^③ 既然买卖双方都愿意以一个合理的价格购买高质量的产品,为什么买者又会开出一

① 这一点不仅可以从瑞典皇家科学院就阿克洛夫该篇论文的点评中看出,还可以阅读以“Lemon Market”为主题的文献。

② 具体论述参见阿克洛夫《柠檬市场》一文“欺诈的成本”一节。

③ 具体论述参见阿克洛夫《柠檬市场》一文“欺诈的成本”一节。

个逼迫卖者退出交易的价格呢？

阿克洛夫在《柠檬市场》的引言中说了这样一段话：

现实中存在许多这样的市场：买主利用某些市场统计数据，对拟购买商品的质量做出判断。在这种情况下，由于高质量所带来的收益将要归于影响统计数据的整个销售群体而不是单个卖主，故卖主就有动机在市场上交易低质量商品，其结果是商品的平均质量趋于下降，市场规模也不断萎缩。（阿克洛夫，2006：8）

尽管这段话主要被用来描述卖主具有出售“柠檬”的动机，但在笔者看来，却提供了解决上述悖论的线索。在对于逆向选择的讨论中，实际上有一个隐含假设，即买者尽管无法辨别市场上商品质量的高低，却是带着对于产品质量的预先判断进行交易的。当买主对产品是“柠檬”有一个较大概率的预期时，他倾向于压低价格。而这个预期的形成往往是有依据的——即阿克洛夫提及的市场统计数据（如顾客的投诉率或者信用记录等），或者一个更接近生活的可能性是直接向曾经在市场上购买过产品的朋友进行询问。而这个预期的形成不论是依据某种市场统计或者是来自上当受骗的朋友的警告，实际上都体现出了购买者对于信息的依赖。

信息依赖的概念来自社会心理学对于从众现象的研究。该领域的多项研究显示，当被试无法对问题做出准确判断时，会出现和他人的判断保持一致的倾向（这里包括主动获取他人意见和建议的积极性）^①。而这一结论很好地支持了市场中，买主由于在产品质量信息的掌握方面处于劣势，从而具有依据自己获得的统计数据或通过询问他人，预先对产品形成判断的可能性。

如果买者不依赖信息，那么原本出现“逆向选择”的市场又会是怎样的呢？

假设买者在进入市场交易前并未进行相关产品质量信息的收集，那么交易的情况很可能服从一个随机的分布，即买者既可能购入一个“柠檬”也有可能以一个合理的价格买到一辆高质量的二手车。而提供高质量汽车的卖者也会遇到合适的买家将车出售。在这种情况下，市

^① 具体研究的介绍参见 Hewstone & Stroebe 2001: 405—407。

场中更可能出现高质量的车和低质量的车同时存在的现象,而不是出现“逆向选择”中低质量车将高质量车逐渐驱逐出市场的结果。

由此,笔者认为,“柠檬市场”的形成作为一个连续渐进的过程,买卖双方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只是其一个必要非充分条件。逆向选择的机制发生作用,所依赖的另一个重要前提是买方的信息依赖程度。因此,在柠檬市场中,一个完整的逆向选择过程可以按如下表述:

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使得拥有更多产品信息的卖方可以以次充好,将“柠檬”和高质量汽车以同样的价格出售,但这样做的后果之一是降低了该市场的信誉。被骗的受害者不仅很可能自己不会再进入市场交易,并且将这个信息储存,反映在市场的统计指标中,或者直接告知另一位潜在买者,通过这样的信息互相联系,导致后来的潜在购买者在进行交易时对市场产品的质量有了较低的预期。如果说对于市场产品高质量的判断可以使“柠檬”的卖主有利可图,那么反过来,低质量所带来的“统计损害”往往是由高质量产品来承受的。正是这种低于预期的出价导致高质量产品退出交易,市场逐渐萎缩。因此,信息不对称可以使得柠檬的卖主在一次交易过程中获利,而信息依赖却使先前交易的结果对后续的交易状况产生影响,继而在市场的萎缩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二)“种姓经济学”的社会学意涵

一个传统经济学意义中的行为选择与在特定社会规范下做出的选择有着本质的不同(Akerlof & Kranton, 2000)。前者犹如去超市买水果,选择购买桔子还是梨与购买者社会身份和社会关系几乎没有任何关联,因此可由购买者的个人偏好作最大程度的决定。而在某种社会规范下做出的决定却会产生纯粹经济行为所没有的社会后果。

阿克洛夫通过将“指示器”的概念引入到经济学模型,同时也将社会规范和社会互动的分析引入了经济学研究。

在以往以个体主义方法论为基础的传统经济学模型中,当前交易(只要是合法的)并不会使随后交易中的社会关系产生任何变化。在《种姓经济》一文中,阿克洛夫将指示器的概念用于歧视现象的分析上,由此提出了不同于贝克尔和阿罗所主张的“歧视心理偏好”的解释(Berker, 1957; 阿克洛夫, 2006)。

新古典理论对于种族歧视的解释一直不能令人满意,因为按照企

业利润最大化的假设,雇主应该会雇用那些被歧视群体的廉价劳动力从而获得更多的收益,但事实情况却并非如此。

在贝克尔的歧视研究中,歧视被界定为一种具体的个人偏好。具有这种偏好的人宁可承担一定的损失,也不愿意和某个群体的成员打交道。例如,即使有丰厚的报酬,某些人也可能拒绝在一名妇女或一名黑人下面工作,因为他们对妇女或黑人存有偏见;又如,一名想购买汽车的顾客因为偏见可能不愿与一名黑人推销员谈生意。按贝克尔的概括说法,“当歧视行为付诸实施时……这个人要么是为此直接付费,要么是放弃一部分收入。当把问题简化为以这种方式来看待时,我们才触及到了偏见与歧视的精髓”(Berker, 1957; 阿克洛夫, 2006)。

由此,歧视的心理偏好理论的主要观点认为,具有歧视偏好的人在将歧视付诸实施的时候宁可放弃一部分收入的行为,并不意味着这样做是没有效用的。事实上,他之所以宁可放弃一部分收入,是因为这样做可以获得心理上的满足;而他如果压抑歧视感而去取得那部分收入,则要付出心理代价。这意味着,对一个具有歧视偏好的人来说,在不实施歧视获得的收益和歧视行动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替代关系。

阿罗的统计歧视模型则和贝克尔的模型存在本质区别,因为这一模型认为歧视的存在并不完全出于个体的心理偏好,至少存在着一部分经济激励方面的原因。^① 例如,在雇主在无法了解雇员的全部信息的情况下,便倾向于按照群体的统计指标(如年龄、性别、种族等)进行判断,以提高录取高素质的雇员的概率,从而获得最大的效益。虽然利润动机与社会习俗的关系在阿罗的这一模型中已呼之欲出,但在论述整个群体有可能采取歧视行为的部分,阿罗又回到了贝克尔的观点:“产生歧视的内在机制是对歧视本身的嗜好,正是通过这一机制,白人可以实现歧视利润”。^②

阿克洛夫正是从贝克尔和阿罗停步的地方开始,提出了基于社会规范产生的歧视。阿克洛夫认为,当歧视成为某一社会群体的一种习俗或规范时,便与稳定的经济结构关系相互融合。当歧视性行为在该群体中居于主流地位时,非歧视行为被认为是违背群体规则的行为。

① Anow, 1972: 83-102 转引自阿克洛夫《种姓经济学、老鼠竞赛经济学及其他悲惨故事》的“种姓与集团组织”一章。

② Anow, 1972: 99, 转引自阿克洛夫《社会习俗理论及其失业影响》引言部分。

对某个人来说,不遵守规则意味着脱离群体,这要付出代价;而存留在该群体中则可以获得某些益处。在印度的种姓经济中,违背种姓禁忌的人,即使获得了违背行为所带来的经济利益,但他面临的将是被驱逐出所属种姓,并取消该种姓可以享有的所有权利。违背种姓禁忌进行交易所带来的严厉后果无疑是违背行为本身所带来利益无法弥补的,在经过利益的衡量之后,即使有一时的经济激励,在社会习俗约束下的行动者仍会趋向遵守社会习俗以谋求更长远更大的利益。这种逻辑意味着,能够对歧视者构成竞争压力的人,也不得不遵守“歧视”这一群体规则,否则他会为此付出代价。竞争压力因此而自然化解。因此将社会规范引入经济学模型后所理解的歧视,已经不是像贝克尔理解的那样是一种和个人心理成本相联系的偏好,而是群体规则下与心理成本无关的经济利益最大化行为。

(三)失业问题的社会学内核

尽管辑入《故事》一书的论文涉及众多经济问题,但它们的写作却都是阿克洛夫为探求失业问题的直接或间接结果。^①

“究竟什么是失业”历来是宏观经济学的争论不休的议题。20世纪60年代后由新古典经济学家建立的失业模型中界定的失业在本质上都是一种自愿失业(Akerlof, 2007)。在基于“雇主和雇工的行为都符合利益最大化”的假设下,一个失业工人愿意在其工资低于市场出清的薪水或工资水平下工作,他就可以很容易地再找到一份工作,除非是他自己不愿意,否则非自愿失业在逻辑上是不可能出现的。然而这种看似理所当然的推论却面临实证的反驳: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如果较高的失业率源自工人因不满意薪酬而拒绝工作,那么自愿离职应当和失业一起上升。然而现实的情况是,周期性的经济下滑阶段自愿离职反而是减少的(Akerlof, 2002)。

这种用自愿失业的经济模型难以解释的现象,使得行为宏观经济学家更愿意相信非自愿失业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的存在。20世纪70年代后出现的效率工资模型便试图通过专用人力资本、延迟合同(staggered contracts)、不对称信息等概念来证明由于市场存在的种种不

^① 阿克洛夫在《故事》的引言部分提到,父亲的一度失业使得探讨失业问题变成阿克洛夫感情上和学术上的目标。在他的研究计划背后,总隐藏着自已探求解决失业问题的努力。

完善而导致失业的发生。而这些大多数建立在利益最大化基础上的效率工资理论往往被新古典经济学抓住缺陷进而诟病：如果所有的行动者都是利益最大化的，那么通过更为精妙的合同形式（如雇佣分红、季度合约等），只要公司能够建立充满信任的劳动关系的话，原则上都能消除非自愿失业的问题。

在《故事》中明确考察失业问题的3篇论文，即《社会习俗理论及其失业影响》、《以“坝址”看待工作职位》、《部分视为礼物交换的劳动合同》则从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寻求更有说服力的“非自愿失业”原因。

如前所述，工作职位如同坝址的性质使得一个工作职位只能由一名工人占据。如果一个熟练工人的工资价格合理（可以高于市场出清水平），那么非熟练工人即使再降低工资也无法获得这一职位。此外，劳动经济学家也证明相同能力的工人在不同行业、不同企业的工资也可能是不同的（Akerlof, 2002）。

工人的“熟练”与“非熟练”之分，工作的“好”与“坏”之分使得非自愿失业的概念变得有实际意义：失业工人即使愿意降低工资也不一定能够得到工作。

如果非自愿失业确实是存在的，那么一定是企业出于某种原因向雇工支付了高于市场出清的工资。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什么厂商会愿意支付高于市场出清的工资？而对于这个问题的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解答在阿克洛夫看来有着更强的经验说服力。

阿克洛夫提出的以礼物交换为基础的效率工资的模型认为，企业的产出依赖于工人的努力程度，厂商为了对工人的绩效施加影响，向工人支付高于市场出清的工资，而工人回报给企业以高的工作效率和忠诚度。这种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看起来不可思议的“非利益最大化行为”在社会学“互惠交换”的视角中却显得很符合实际。

经济学家最为熟悉的二级劳动力市场模型中，初级劳动力市场提供稳定的工作职位，丰富的晋升机会，并始终支付丰厚的报酬，而在次级劳动力市场则反之，工作不稳定，报酬甚微，劳动力的离职率较高，而对于这种二级劳动力市场的承认则为效率工资的模型建立提供了接受的基础，因为在初级劳动力市场提供的丰厚报酬本身就高于市场出清的工资。

经济学这一内部劳动力市场理论其实很大程度上是以韦伯的科层制研究为基础的。根据韦伯的描述，科层制具有如下特点：1)服从公务

职责; 2)组成牢固的职务等级; 3)分工明确; 4)根据工龄和业绩具有晋升的机会。而这些规则的实现都是以员工对企业或上级付出忠诚为前提的,而阿克洛夫礼物交换模型正是抓住了员工对企业忠诚的重要性展开的论述(Akerlof, 1984a)。

对于工作小群体的社会学研究则直接为阿克洛夫的“合同部分作为礼物交换”观点提供经验性证据,从对于霍桑实验的检验开始,社会学家就发现只考虑工人们单向对权威、正式规则的服从是远远不够的,相反很多研究都显示了一种复杂的均衡,这种均衡表明了工作组织中形式上和实际上的互动的区别,工人们有不同程度的开放性,可以设立不同的非正式工作规则,这些规则与正式的工作规则也有很大不同。与工作场所的习俗(与规则不完全相同)一致的官方的工作规则被加强,反之则有可能被削弱。

社会交换理论中,人类的社会行为不是单纯的刺激—反应,而是一种理性行为。人们在选择行动时,不仅考虑行动后果的价值大小,而且考虑获得该后果的可能性,通过理性能够全面权衡、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行动(贾春增编,2000)。正如霍曼斯的小群体研究(Homans, 1954),在同一地理环境中生活工作的人,培养出共同的信仰、传统以及友谊,使得人们彼此行为之间产生了一定程度的相互认可,即“约定俗成”。随着互动程度增多就会形成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而通常正是这种群体规范决定了工人们与雇主之间的互相“赠予”比例,雇佣双方对于这种“互惠”行为规范的遵守,维持着群体的整合和日常运作,在这个过程中逐渐衍生出“公平工资”的观念。

在“礼物交换”模型中工资的最终决定正是由市场和当事人对“公平”的界定共同作用的结果。比如一些公司自愿对退休员工增加分红,尽管这些工资对公司在现任和未来员工中的声誉起到积极作用,更自然的解释是,这些工资并非出于公司利润最大化的考虑,而是一种“公平”的承诺(Akerlof & Yellen, 1987)。

在社会心理学的公平理论中,对于“公平”的预测与标准是主观测量的。对于雇主应该支付什么样的工资才算是对自己努力工作的公平回报,雇员们往往会形成自己的预期和标准。在霍曼斯的现金登记员的行为研究中(Homans, 1954),这些职员对雇主怀有“公正性期待”,即个人在过去工作中所付出的努力和所得到的回报的比例关系构成主观的预期,个人在当前或今后的行动中仍然期待着这一比例关系在同样

情况下再现。若他的实际获得少于这一期待时(即使这种实际获得和市场出清水平持平),就会感到不公正,产生相对剥夺感,从而通过种种行动,如消极怠工、对企业忠诚度下降来表达自己的不满。而这种公平感是在与其设定的参照群体的比较下形成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一些实际薪水较高的雇员仍在抱怨,而一些实际薪水较低的员工工作积极性却很高。

这种来源于社会交换理论和公平理论的公平工资/努力假设正是阿克洛夫提出的“部分作为礼物交换”的效率工资的核心。阿克洛夫采用社会交换视角的效率工资理论避免了以往效率工资理论所受到的“假设不切实际”的争议的同时,也和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的工资差异和失业现象相符合。

(四)小结:寻找经济学中丢失的动机

以上对阿克洛夫几篇主要论文中运用社会学理论和研究成果修改经济学的隐含假设的逻辑进行了分析。

通过对信息不对称问题、种姓歧视问题以及以合同作为部分礼物交换的效率工资模型的评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过去的经济学中几乎完全忽略了社会互动和社会规范习俗对经济活动中的个体/群体决策的影响。为什么经济学家们会将这些社会学家研究的重要概念像“系统缺省”一样自动摒弃在他们的研究和模型之外?在阿克洛夫看来问题主要出在如今主导经济学的方法论上。太多的经济学家沉迷于实证经济学(positive economics)中,一味追求模型的简洁。^①比如,新古典经济学中的最大化模型对效用只做了客观化的定义,的确要比那些将人们主观想要遵守某种社会规范的效用也纳入考虑之中的经济学模型要简洁得多,但是这种简洁性使得对于人类社会规范的经验性研究成果无论多么有力,都难以被纳入其考虑之中。在阿克洛夫看来,经济学“简洁至上”的方法论偏好致使很多社会现实都被自动排除在它精妙的数理模型之外,加上它自己的假设检验能力无法发现本身存在的偏误,由此导致了经济学很容易走向脱离实际的歧途(Akerlof, 2007)。阿克洛夫指出,如果真实的行为和那些从抽象的偏好中推论出来的行为是

^① 经济学大师弗里德曼甚至认为经济学家们可以在觉得必要的时候牺牲现实来达到这种简洁性。参见Friedman, M. 1953, 转引自Akerlof 2007: 53。

不一样的,那么新古典经济学是没有办法注意到这些差别的,而将基于观察所得出的规范融入进来的模型则会自动包括这些可能性。

相比之下,自然主义的取向有着迥然不同的方法论。在这种方法论的指引下,经济学家将会对决策者进行仔细的观察,并试图勾画他们的行为动机,并以这些动机特征作为经济学建模的基础。如凯恩斯之前所说,经济学家应该将模型建立在“我们对人类特质的了解以及细致具体的经验现实上”。而这些正是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民俗学家在做的事情。

人们的决定很有可能是受他们自认为“应该如何行为”的观念所影响的。规范通过行为者的种种特性而形成,并逐渐被整个群体所知晓并遵守。根据这一观点,经济学需要将消费者、投资者以及工资和价格制定者对于他们“应该如何行为”的规范纳入考虑之中。

实际上,经济学家构造的“理想”模型也常常遭受现实的打击。新古典经济学家常常用市场过程中的种种摩擦,诸如信息不对称、短视、贷款约束等来解释模型与现实的出入,但如此一来,他们自以为找到的答案使他们忽视了更重要的一点:就算这些摩擦全都忽略不计,模型与现实之间仍旧是相违背的。

由此,阿克洛夫认为将基于对现实世界仔细观察所总结出来的社会规范纳入宏观经济学的理论模型中是大有裨益的,事实上他的PSA经济学也正在朝着个方向努力。他指出,新古典经济学对于旧凯恩斯主义者过于原始粗糙的批评是中肯的:先前的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确没有对人们在消费、投资以及工资和价格制定上的选择倾向给予足够重视。只可惜新古典主义过于急切地想彻底摆脱凯恩斯主义的影响,玉石俱焚的后果使他们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对于数理推理工具的过于相信和依赖以及对观察和经验的不屑一顾,使得现在的经济学失去了凯恩斯经济学对于现实的敏感性。

而阿克洛夫试图建立的PSA经济学,吸取包括社会学在内的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将人类社会中极其重要的互动和行为规范纳入宏观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中,无疑是取了两家之长,使得“人们对于自身行为的观念”的现实观察和人们决定的目的性在经济学中作了很好的结合。

四、总 结

(一)经济学方法论的调整

宏观经济学在 20 世纪 60 年代早期至 70 年代晚期出现了变化,60 年代早期的宏观经济学完全是凯恩斯主义的。^① 直至 10 多年后卢卡斯等人发表了“凯恩斯宏观经济学之后”,对于凯恩斯主义的狂热才开始降温。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走下坡路部分是因为当时发生的通货膨胀和失业,而这些现象恰恰是凯恩斯理论不能很好解释的。另一个原因则是由于宏观经济学方法论的转变。

凯恩斯主义者把他们的模型建立在对于动机的观察上,而不是抽象的推论上。20 世纪 70 年代后,一个基于古典经济学而产生的新古典学派对凯恩斯学派注重观察得出结论的“随意”做法提出异议。他们认为应该基于利益最大化的企业和效用最大化的消费者来建构经济学理论。^② 这一新的思潮在宏观经济学中产生了重大影响,几乎完全颠覆了凯恩斯主义者原本认为无可置疑的结论。这些欲将凯恩斯经济学付之一炬的声讨使宏观经济学家们大吃一惊,但是对于反凯恩斯主义在最大化假设下建立的那套看似合乎情理的逻辑推论,他们却并未提出质疑。

一方面,新古典经济学家坚持认为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家思路是不对的,在他们看来科学的推理正在产生一种更新、更可靠、更精确的经济学;另一方面,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认为新古典理论在逻辑上并没有问题,也接受了这些古典经济学家在方法论上的取向:利益和效用函数的最大化是宏观经济学恰当的微观基础。他们通过在新古典模型中加入诸如市场失灵、信息不完全、合同滞后、税收扭曲等众多摩擦因素而保留了周期波动和宏观经济学政策等凯恩斯的部分理论。至此,

① 这体现在当时的教科书从入门到研究生课程都惊人的统一。凯恩斯在死后还上了时代杂志的封面。弗里德曼有一句虽带有误导性却十分著名的宣言:我们现在都是凯恩斯主义者。

② 新古典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不同的 5 个理论有:生活周期收入恒定假设(Life-cycle permanent income hypothesis)、莫迪利安妮-米勒定理、理性预期理论、失业的自然率理论以及理查德均衡。这些结论否定了凯恩斯主义关于“经济学行为和稳定性政策的作用”的观点(Akerlof, 2007)。

凯恩斯理论在宏观经济学中已沦为应景的点缀。

而阿克洛夫的 PSA 经济学则为宏观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首先,与新古典以及新凯恩斯主义一样,他认为行为的确是来自于效用和利益的最大化的,由此抓住了经济抉择的“目的性”特点,但更重要的是阿克洛夫对当今主流经济学理论中对于最大化的假定提出了质疑。他认为,这种效用最大化的界定太过狭窄,仅仅指的是决定者的消费和休闲,却没有将决定者的规范纳入考虑之中。

早在 20 世纪初年,帕累托就指出:这样一种效用特征忽视了动机的重要方面。根据帕累托的定义,人们总是对他们应该怎么做不应该怎么做有自己的想法;同时也对别人该如何行动有自己的观点,而这种想法和观点被称为“规范”,它们可以是个人的,也可以是社会性的。^①规范的作用可以很容易从人们的偏好中反映出来,通过修正效用函数,就可以将自己或他人未能达到先前设定标准时所遭受的效用损失补充进去。

社会学对于“规范”更有着具体的研究^②,使“规范”的概念得以更自然地加入到效用函数中去。在社会学看来,人们对于他们该做或不该做的事情有一个理想型,这种理想型在人们与其他人互动中被内化。PSA 经济学所倡导的是新古典经济学经济选择理论和凯恩斯主义强调社会观察相结合的新综合。这种综合会最大程度地利用这两种研究路径的优势,将“行为是否符合规范”纳入为效用增减的影响因素。在修正后的经济学效用函数中,反映这种规范的偏好使得那些凯恩斯在《通论》中被强调的社会、心理因素在即使没有市场摩擦的情况下也能重新浮现,由此产生了一种仅靠市场摩擦所不能建立的宏观经济学。

(二) 经济学与社会学关系的重新定位

阿克洛夫的 PSA 经济学研究取向在宏观经济学中引起的反思,为经济学与社会学关系的重新描绘创造了契机。

如前所述,经济学和社会学之间关系的探讨是近来才在学界活跃起来的话题,但要描述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关系却不是一件太困难的事,因为经济学与社会学之间的联系不外乎以下几种方式。一种是两门学

① 可参见 Pareto, Vifredo 1980 转引自 Akerlof, 2007。

② 可参见 Mayo, E. 1949; Homans, George C. 1961; 均转引自 Akerlof, 2007。

科都可能取对方的论题以代之,这可能就是“经济学帝国主义”或“社会学帝国主义”^①形成的缘由。要不就像20世纪那样,两门学科各自囿于自己的独立研究领域,互相不理睬。最后,经济学和社会学之间或许还可以开启疆界,自由交流,互相借鉴,互相学习。这是阿克洛夫努力引导经济学前进的方向,也是本文写作所怀的初衷。

尝试去划定经济学与社会学的边界不仅在现在的学科交叉发展的趋势下成为越来越难以完成的任务,更关键的问题在于它本身也不是一件值得着力去做的事。就像将注意力从解决实质问题这一真正的科学任务转移到去探讨方法论的孰优孰劣上,无疑是对学科宗旨的背叛。

现在很多问题在分析之前首先要按主题被分成“社会学”的、“经济学”的或两者兼而有之的;分析时的路径也要被分成“社会学视角”还是“经济学视角”,很显然,这里的经济学和社会学是没有进行有效互动的。人们在分析社会问题时往往先要将其经济学特性剔除,在分析经济学问题时又要先把其社会学特性当作是随机偏差而不加讨论。现在看来,这种分离产生的问题比它所解决的问题要大得多。正如瑞典经济社会学家斯威德伯格所说,多数现实问题并不能像学术科目一样简单地归类在“经济学”或“社会学”名下(Swedberg, 1990)。阿克洛夫致力研究的“失业问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回想亚当·斯密、韦伯、马克思生活的时代,经济学和社会学很好地结合在一起。这些伟大的学者是经济学家同时又是社会学家,他们靠经济学和社会学的交叉研究,对重大社会问题做出分析,并能轻松地就经济学理论和社会制度问题进行写作,提出深刻见解。在那个时代,“经济学”和“社会学”并不作为两门独立的学科单独存在,经济学家们非常清楚,他们涉及的经济主题和社会主题的界限并非是绝对的。将斯密等人与许多后来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区别开来的,是他们以一种宽容和包容的方式定义经济学的胸襟以及对其他社会科学卓见的浓厚兴趣。按照穆勒的说法,这只是一个普通常识,即“对其他事物一窍不通的人多半不是一个好的经济学家,各种社会现象都彼此交互作用着,如果孤立起来,则不能加以正确地理解”(斯威德伯格, 2003:9)。

^① “社会学帝国主义”的出现源于“社会学”一词的创造者奥古斯特·孔德。在他的著作《论实证精神》中,将“社会学”构想成各个社会科学的综合体,并将其视为实证主义科学体系之王(孔德,1996)。

或许正是应了“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句中国的古话，在某种意义上，偏离了太久，事情就会向正常状态回归。上世纪经济学和社会学之间的彼此疏离，目前看来正走向结束，两门主要的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正趋于缓和。阿克洛夫 PSA 经济学的逐渐发展对于这两门学科来说，有了一次相互进行有益交流的机遇，为全面研究经济学和社会学领域中的一系列重要问题提供了一种全新视角。

本篇对于阿克洛夫学术作品的评述旨在展现其倡导的 PSA 经济学对经济学方法论以及经验研究的极富潜力的启示。阿克洛夫就像一个勇敢的行者，对于现实问题的关注使他跨过学科的疆域，从其他社会科学优秀研究成果中汲取了巨大能量，并尝试修改经济学长期以来奉为圭臬的前提假设，向一直自信的主流经济学提出挑战，并以此开辟宏观经济学的新阶段。他在学术作品中将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理论直接运用于宏观经济学中诸如失业等迟迟不能很好解释的问题，并得出了符合逻辑也符合现实的解释。

在理论创新上，阿克洛夫无疑是富有想象力的，但同时他又是谦虚严谨的。正如阿克洛夫所说的，至少从目前看来，PSA 经济学能够解决的问题是有限的，他并不愿意对如何从事 PSA 经济学研究整理出一套标准的指南（斯威德伯格，2003），也不急于在这一方法还未完全成熟的情况下就推广到更多的问题上。

阿克洛夫的论文为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结合提出了几个可行的范例，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不是每一次结合都必然能产生出振奋人心的有趣结果，如果仅仅是为了结合而结合，或者当一个经济学理论无法继续推进的时候才寻求其他社会科学帮助的话，那么除了降低理论本身的解释力和信服力外，对于两个学科的融合并不会太多帮助，这也是 PSA 经济学难以为人重复的原因之一。此外，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是，经济学家中能真正理解社会学理论的人为数不多，而社会学家中能够明白经济学模型的人就更少，因此，PSA 经济学究竟能否完全发挥它的能量，开创出经济学和社会学更多有益有效的交流，远不是阿克洛夫一人能够完成的，从某种意义上说，PSA 经济学更像是一种打破学科疆域进行研究的理想，阿克洛夫将人类社会生活的其他相关因素融入经济学研究的最终梦想无疑需要更多经济学家和包括社会学家在内的其他社会科学家一起探索和努力。

参考文献:

- 贾春增编, 2000,《外国社会学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杰弗里·萨克斯、菲利普·拉雷恩, 2004,《全球视角的宏观经济学》,费方域等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 孔德, 1996,《论实证精神》,北京:商务印书馆。
- 理查德·斯威德伯格, 2003,《经济学与社会学》,安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 刘凤良、江艇, 2004,《行为宏观经济学的方法论意义》,《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第2期。
- 罗伯特·K.默顿, 2001,《社会研究与社会政策》,上海:三联书店。
- 乔治·阿克洛夫, 2006《一个经济学理论家讲述的故事——关于经济学理论新假设有趣结果的论文集》,胡怀国译,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 , 2002,《行为宏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行为》,吴敬琏编《比较》(第3辑),北京:中信出版社。
- Akerlof, G. A. 1970, "The Market for 'Lemons': Quality Uncertainty and the Market Mechanism."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84.
- 1976 "The Economics of Caste and of the Rat Race and Other Woeful Tale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90.
- 1980 "A Theory of Social Custom, of Which Unemployment May Be One Consequenc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94.
- 1981, "Jobs as Dam Sites."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48.
- 1982 "Labor Contracts as Partial Gift Exchange."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97.
- 1984a, "Gift Exchange and Efficiency Wage Theory: Four View."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4.
- 1984b, *An Economic Theorist's Book of Tal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2002 "Behavioral Macroeconomics and Macroeconomic Behavior."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7.
- 2007, "The Missing Motivation in Macroeconomics." Presidential Address of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Chicago, IL, January 6.
- Akerlof, G. A. & J. L. Yellen 1987, "Rational Models of Irrational Behavior."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7.
- Akerlof, G. A. & R. E. Kranton 2000 "Economics and Identity."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5.
- Arrow K. J. 1972, "Models of Job Discrimination." In *Racial Discrimination in Economic Life*. Lexington, MA, DC: Heath.
- Berker, G. S. 1957, *The Economics of Discrimin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76 *The Economic Approach to Human Behavio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Friedman M. 1953, "The Methodology of Positive Economics." *Essays in Positive Economic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Granovetter, M. 1985,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1.

- Hewstone M. & Wolfgang Stroebe. 2001, *Introduction to Social Psychology: A European Perspective*.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 Homans, G. C. 1954, "The Cash Posters: A Study of a Group of Working Girl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
- 1961, *Social Behavior: Its Elementary Form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Lucas R. E. 1995, "Monetary Neutrality." Nobel Prize Lecture, December 7. http://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economics/laureates/1995/lucas-lecture.html
- Mayo, E. 1949, *The Social Problems of an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 Pareto, Vilfredo 1980, *Compendium of General Sociology*. Trans. by Elisabeth Abbott.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Swedberg R. 1990,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Redefining Their Boundaries: Conversations with Economists and Sociologists*.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The Royal Swedish Academy of Science 2001, "The Sveriges Riksbank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s in Memory of Alfred Nobel 2001: Information for the Public." <http://nobelprize.org/nobel-prizes/economics/laureates/2001/public.html>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责任编辑：杨 可

Practicing Gender and Practicing Medicine: ‘ Tradition’ and ‘ modernity’ in post-colonial Hong Kong *Siimi Maria Tam* 188

Abstract: Individuals constantly negotiate their identities in fluid social environments and gender is an integral part of this negotiation. As Hong Kong flounders in a postcolonial transformation, its women doctors strive to anchor themselves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They find themselves in a dilemma; while medicine is considered “modern” and “masculine”, as women they must manifest “traditional” and “feminine” qualities. Together with class identity and occupational hierarchy, gender negotiations have reinforced their individual helplessness, and have reproduced a male-centered work system and a patriarchal ideology. The paper concludes that gender is both ideology and praxis. As such it is important that researchers must historicize and contextualize, and through analyzing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gender difference and individual agency, seek to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ender and culture.

REVIEW

A Review on Psycho-socio-anthrop Economics of Akerlof
..... *Hu Qianying* 207

Abstract Economic theory has traditionally relied upon a tacit and “classical” set of assumptions that have gradually acquired a life of their own in defining how economists write and how they justify economic models. In consequence, consideration of alternative assumptions has become taboo. Recognized as one of the founders of information economics George A. Akerlof, the 2001 Nobel Prize laureate in economics, who is famous in the academic community for his asymmetric information study, has a bigger dream to realize; the development psycho-socio-anthrop (PSA) economics in the original spirit of Keynes’ general theory. Exploring the findings of other social sciences such as psychology,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Akerlof tries to break the taboo in economics and bring new assumptions into economic theory. This review has introduced some of Akerlof’s important works and analyzed sociological hypotheses in PSA economics. It has also aimed to show PSA economics’ potential benefits for redefining the relation between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BOOK REVIEW

Polimorphic Globalization and the Consumer Agency
Reading George Ritzer, *The globalization of Nothing*
..... *Zhang Dunfu* 233